

文章编号:1005-0523(2012)04-0123-04

解构《发条橙》之反面乌托邦主题

姜桂芬

(华东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摘要:《发条橙》是英国当代作家安东尼·伯吉斯的代表作之一。由于小说的暴力/反暴力主题和它对现实的冷静而悲观的分析,被评论界归类为反面乌托邦小说。该小说的反面乌托邦主题主要体现在人性困境,权利斗争和价值冲突等三个方面。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作品进行解构分析,希图从新的角度阐释小说的反面乌托邦主题。

关键词:《发条橙》;反面乌托邦;解构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安东尼·伯吉斯的代表作。一般人认为《发条橙》是通俗科幻小说,唯独其作者力排众议,坚称这部小说强调自由意志和行为主义心理学。由于小说的暴力/反暴力主题和它对现实的冷静而悲观的分析,被评论界归类为反乌托邦小说。与国外始于19世纪70年代的与时俱进的《发条橙》研究相比,国内对《发条橙》介绍并不多,如王佐良等主编的《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史》对其“只字未提”。到2000年小说被译成中文后,加之著名导演斯坦利库比里克的同名电影的解禁与流传,《发条橙》才在国内文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学者也随之开始从自由困境、宗教问题、道德选择权等方面对小说的主题进行研究。纵观国内外对该小说的研究现状,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工作几乎没有结合或者运用一些文学批评理论,这样一部富含哲理的小说,如果脱离理论分析的支持,其蕴含的意义将得不到充分显现。据发现,最近几年,在国内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领域,出现了反面乌托邦小说研究热。崔竞生、王岚认为乌托邦这个主题根植于深厚的文化群体中,许多文学作品内部包含大量的“乌托邦情结”,探讨这个主题对我们进行文学批评和欣赏大有裨益^{[1]620}。因此,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该小说的反面乌托邦主题进行解构研究,希望为安东尼·伯吉斯的创作目的和《发条橙》的意义提供全新的阐释。

1 《发条橙》的反面乌托邦主题

反面乌托邦(dystopia)是把展望未来理想社会的乌托邦描写作为讽刺幽默手段加以运用,预示未来世界的恐怖可怕,讽喻现实社会的丑恶腐败^{[2]637}。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及作家对深重的灾难会表现出“救世”愿望。反面乌托邦作品也一样,作者是人类的“守望者”,给人们指出灾难的前景,以期引起人们的警惕。由此可见,反面乌托邦小说便是通过描写一个虚构或想象的未来世界,影射现实社会,向人们发出警告。这种预示性的警告,使人们在畏惧、恐慌之余,能有所戒备,从而采取及时的,有力的措施来克服弊端,消灭可能导致灾难和毁灭的一切因素。这也是反面乌托邦小说的主要意义所在。

在《发条橙》中,伯吉斯借助反乌托邦的形式,给我们描述了一个恐怖的未来人类社会,主人公目无法纪,无恶不作。在某种程度上影射了当时的现实社会,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在小说中,伯吉斯通过讲述反面英雄亚历克斯被“洗脑”前后的不同遭遇,提出了人性的善恶问题。我们在质疑善恶是否存在对立的同时,发现它们之间的分界线已经模糊化,衡量它们的标准也并非绝对,因

收稿日期:2012-06-13

基金项目:华东交通大学科研基金项目(10WY05)

作者简介:姜桂芬(198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为人性中的善恶取舍是主体选择的结果。主人公亚历克斯选择作恶,采用了最极端的行为方式捍卫自己的个人自由,以至侵犯到了其他人的权利。按照洛克(John Locke)“政府契约论”的原理以及西方天赋人权的理论,每个人生来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但是及至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往往会侵犯到其他人权利的行使。那么如何来协调这个矛盾呢?我们每个人让出自己的一部分权利,形成一种公权利,然后在公共权利允许的范围内,实现自由的最大化。我们把惩治暴力,抵御外来侵略等交由这种公共权利来处理,即国家机器的产生^[3]。当社会权利过于集中,自由平等无法实现,自由主义来缓解;而社会一旦自由泛滥,危害社会的行为无法控制时,极权主义现身约束制止。它们之间彼此约束,互相制衡,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比较理想的社会状态。这里所涉及的反面乌托邦主题是如何在小说中体现的呢?下面本文就对其进行分析解读。

1.1 解构反面乌托邦之人性困境

《发条橙》通过讲述了一个名为亚历克斯的青少年遭受“洗脑”前后的故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人性困境的问题:一个被迫为善的人好过一个自主作恶的人吗?故事开始时,15岁的中学生亚历克斯和他的“哥们”,白天去学校,到了晚上他们去奶吧喝‘牛奶泡刀’(掺了迷幻药的牛奶)。借着毒品的刺激,他们到外面‘寻欢作乐’:戏弄老人、抢劫商店、和其他帮派打架,闯进别人家里大发淫威……他们做这些并不是为了抢劫或是报复,仅仅纯粹为了作恶的快感,为了释放他们身上过剩的精力。当亚历克斯入狱后,他被迫做了“路多维哥氏技术”的试行者,这种技术通过药物加上恐怖视觉刺激来改造犯人的思想,使其无法用自己的意志去施行危害社会的行为。他被迫选择了善,一想到暴力、性、甚至音乐,就会马上恶心呕吐。在故事开始时他们做过的事情,都变成了能折磨他致死的毒药。他成了一只“上发条的甜橙”。出狱后,无害又无助的亚历克斯险些成了反政府人士的牺牲品,他们试图逼死毫无反击能力的亚历克斯,并利用他的死来攻击政府。以前无恶不作的施暴者现如今成了手无寸铁的受害者,我们不禁怀疑到底孰是孰非:自由选择作恶的亚历克斯还是被迫为善的亚历克斯呢?小说中监狱教诲师的一席话似乎向我们揭露了问题的答案,“上帝是想要善呢?还是向善的选择呢?人选择了恶,在某个方面也许要比被迫接受善更美妙吧?”^{[4]103}

一个被迫为善的人并不比选择作恶的人强。对亚历克斯来说,“善”“恶”不过是人性中对立的两面,它们之间无所谓对错,也没有价值判断。在他看来,“不去探究‘善行’的根源何在,那为什么要追究其对立的门户呢?如果人们善良,那是因为喜欢这样,我是绝不去干涉他们享受快乐的,而其对立面也该享受同等待遇才是,我是在光顾这个对立面……而我的所作所为,是因为喜欢做才做的。”^{[4]57}亚历克斯选择了恶,是因为他本性所爱。而他的向善是人为的外在动机所致,是当权者想通过控制人民的欲望来统治人民。他们借助“路氏技术”,扼杀亚历克斯所有施暴因子的同时,也泯灭了他作为人的最至关重要的东西:自由选择。他们治疗的仅仅是暴力这个“病症”,并没有找到亚历克斯罪恶的“病根”,甚至忘却了他们在亚历克斯的罪恶形成中充当了帮凶的角色。正如小说中F·亚历山大所言,“他们已经把你变成了非人的东西,你再也没有选择的权力。你已经委身于社会所接受的行为,成了只行善的小机器。”^{[4]152}伯吉斯借亚历山大之口告诉我们,“路氏技术”的动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一个无法选择的人已不再是人。

1.2 解构反面乌托邦之权利斗争

当亚历克斯与一群小青年混迹街头,以毒品、暴力、性以及一切反社会的行为为乐趣时,我们不禁困惑:为什么他们能如此嚣张?为什么这些行为没有受到约束呢?一方面,他们想尽各种办法摆脱警察的抓捕,比如抢劫时戴面具,事先买通目击证人等等。另一方面,人类科学技术相当发达,已经在月球上建立了定居点,无暇关心地球上的法律秩序。这些小青年之所以能为所欲为,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的渎职。

除此以外,当权者更多关注的是政绩而不是民生,这必然会导致权利的滥用。权力的行使可以通过伪装、劝服或操纵来使他人的思想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转变^{[5]79}。为了保障自己的统治地位,当权者们抓捕政治犯,征召小流氓来补充警力……监狱人满为患,他们就用“矫正治疗”技术改造罪犯。至于罪犯出狱后是否能正常生活,他们毫不关心。正如布罗兹基大夫所言,“我们所关心的,不是动机,不是高尚的伦理

规范,而仅仅是减少犯罪……和缓解监狱的人满为患。”^{[4]128}亚历克斯被彻底改造了,他不能作恶,无法再享受音乐,因为这一切都变成了生理痛苦的刺激物。

当权者用民众的自由换取了自己的权利。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统治,政府试图通过法律和暴力来控制人民。不惜动用高科技,给他们洗脑,将他们改造成没有思想的机器,剥夺他们自由选择的能力。而普通民众为了片刻的宁静,任由其摆布与控制,不惜牺牲掉自己的自由。

F·亚历山大,小说中另一个亚历克斯(亚历克斯是亚历山大的简称),政府的渎职和青少年犯罪的另一个受害者,一个写《发条橙》的作家,在这里已经成为伯吉斯的代言人。他呼吁人民为自由而战,指出与个人的自由相比,政府的权利一文不值。“伟大的自由传统必须捍卫……党派名称一钱不值,自由传统高于一切。普通老百姓会不闻不问,没错。他们宁肯出卖自由,来换取平静的生活……”^{[4]156}

在小说中,个人的自由与当权者的权利已无法共存。主人公亚历克斯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而当权者则是最高权利的执行者与维护者,短期内他们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协调与统一的。

1.3 解构反面乌托邦之价值冲突

鲁宾·拉比诺维奇认为,小说《发条橙》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冲突是:自由意志和独裁主义,对应的就是贝拉基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6]43}。

奥古斯丁主义得名于拉丁教父奥里留·奥古斯丁。他是古罗马帝国时期基督教思想家,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教父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幼年时曾从母亲加入基督教,但19岁在修辞学校读书时成为摩尼教追随者。在罗马天主教系统,他被封为圣人和圣师,并且是奥斯丁会的发起人。对于新教教会,特别是加尔文主义,他的理论是宗教改革的救赎和恩典思想的源头。

在早期基督教神学中,人性论构成了上帝论和基督论之外的第三个重要领域,而基督教人性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原罪”与“救赎”。奥古斯丁认为只有善才是本质和实体,它的根源就是上帝,而罪恶只不过是“善的缺乏”或“本体的缺乏”。上帝作为至善,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并没有在世間和人身创造罪恶。罪恶的原因在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自愿地背离了善之本体(上帝)。

贝拉基是不列颠的隐修士,401年到410年间来到罗马传教,405年曾与奥古斯丁发生了神学交锋。后来贝拉基转向北非和东方,在那里影响了一批追随者,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贝拉基主义”的神学派别。贝拉基认为,一个人犯罪只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由于亚当的遗传,亚当所犯的罪只能由他自己来负责,他的子孙不应当因此而遭受苦难。既然罪是由于自由意志所致,那么罪的解除同样也应该取决于自由意志,一个人得救的关键在于他自己的道德努力,基督并没有救赎世人的罪,他只是为人类行善做出了榜样。

针对贝拉基的观点,奥古斯丁指出,尽管最初的人性是纯洁无邪的,但是自从亚当堕落后,人性就被注定成为有罪和邪恶的。罪固然是因自由意志所致,但是罪的解除却不能靠自由意志,因为已经被罪恶所控制的意志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意志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一部分人的意志重新获得向善的能力,摆脱必死的罪性而获得灵魂的永生^{[7]82}。

在小说中,贝拉基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的冲突主要体现在不同时期政府所采取的政策上。小说开篇时,展现在读者眼前的社会无政府状态暗示我们,当权者是贝拉基自由主义者。根据贝拉基主义教义,“人类的意志是完全自由的,他们随时准备行善或者作恶。”^{[8]58}亚历克斯和他的小混混们正是如此。他们放纵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欢作恶。周围的环境也给他们犯罪提供了便利,他们经常光顾的柯罗瓦奶吧给他们这群不满十八岁的青少年提供毒品,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对其进行制止。城市里犯罪横行,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没有一丝安全感,更谈不上安居乐业。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当权政府宽松的政策。

新内政部长的上台标志着奥古斯丁主义的政府掌权了。奥古斯丁主义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无法容忍政治犯罪。监狱为了腾出空间来关押政治犯,决定依赖能控制人类自由意志的现代行为技术来改造犯人,好让他们尽快出狱。为了缩短刑期,亚历克斯自告奋勇作了小白鼠。治疗产生了效果,该疗法受到

政界及宗教界人士的赞赏,报刊也大肆渲染。此时监狱外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公寓的电梯被修缮一新,墙面上不堪入目的涂鸦也已经被拭去,警力也壮大起来,社会也似乎重现光明了。和监狱里施行改革一样,发生在外面的这一切也昭示社会正经历一场变革:从贝拉基自由主义执政过渡到奥古斯丁主义。预示着一个更加专制的政府即将上台。

在小说中,奥古斯丁主义和贝拉基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不会终止的,他们之间的拉锯战构成了主人公亚历克斯故事的核心。换句话说,这也是部展现贝拉基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党派循环交替的故事。

2 结语

王之光在《发条橙》的代序中,曾说过,除了《发条橙》,还有《缺少的种子》和《尘世权利》(Earthly Powers),都表明伯吉斯的信仰游移于残存的贝拉基主义和奥古斯丁教义之间。这对于拥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天主教后裔安东尼·伯吉斯来说,创作反映奥古斯丁与贝拉基主义之间对立的作品不足为奇。自14岁以来,他一直保持一种既不激进又不保守的态势,有点“含糊的愤世嫉俗”。他摒弃了天主教后,自称是摩尼教徒^{[9]44}。摩尼教对世界结构持有二元观念,宣扬最高的二元论是:上帝和恶魔是同权的^{[11]155}。作为一个摩尼教徒,伯吉斯想告诉我们,无论亚历克斯生活的社会是偏自由主义还是偏极权主义;无论人民是向善还是作恶,这些二元因子将共存于世,因为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

参考文献:

- [1] 赵一凡. 西方文论关键词[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613-620.
- [2] 侯维瑞. 英国文学通史[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 [3] 洛克. 政府论[M]. 刘晓根,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
- [4] 伯吉斯. 发条橙·莫扎特与狼帮[M]. 王之光,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 [5] 管淑红. 意识流小说《达洛卫夫人》的批评话语分析[J]. 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10,27(4):75-81.
- [6] RABINOVITZ R. Ethical values in anthony burges's ACO [J]. EBSCO,2002,98(246):43-51.
- [7] 赵林. 罪恶与自由意志——奥古斯丁‘原罪’理论辨析[J]. 世界哲学,2006(3):77-85.
- [8] MCKENNA S J. Pelagius and pelagianism [M].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XI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7: 55-65.
- [9] RIES J. Manicheanism [M].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IX. New York: McGraw-Hill Book Co, 1967.

Deconstruction of the Dystopian Theme of *A Clockwork Orange*

Jiang Guife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Abstract: *A Clockwork Orange* is one of the masterpieces of British writer Anthony Burgess. The novel is classified as a dystopian novel by the critics because of its violence-antiviolence theme and dispassionate analysis on real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interpret the dystopian theme of the novel in terms of the dilemma of humanity, struggle of powers and value conflicts.

Key words: *A Clockwork Orange*; dystopia; deconstruction